

中国电影家列传

第一集

中国电影家协会
电影史研究部
编纂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北京

中国电影家列传 (第一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175,000字

1982年4月第1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其中纸精本2,600册)

统一书号：8061·1679 定价：(平) 1.50元
(纸精) 2.00元

内 容 说 明

《列传》约分八集，全面介绍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作出贡献的编、导、演、摄、录、美、技术、音乐、评论家、企业家等约七百人（包括港台的著名电影艺术家）。

本集选录的是从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即登上影坛和文坛的老一辈电影家共四十七人，其中有夏衍、蔡楚生、沈浮、阮玲玉、陈波儿、白杨、赵丹、魏鹤龄、陈荒煤等人。每篇传记刊有肖像照，并有自1913年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影片剧照、工作照一百五十幅左右，照片形象生动，是非常珍贵的影史资料。本书具有科学性、学术性和知识性，可供电影爱好者和研究者参考。

撰稿人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国成	于丛杨	马中兴	田奇
艾静	卢晓康	江淑珍	会林
绍武	孙海涛	阎敏军	李文斌
李梦学	吴泰昌	陈野	陈同艺
陈朝玉	陈秉堃	陈家璧	姜思慎
岩冰	罗拯生	封敏	张丽敏
俞小一	郑延顺	郑学德	晓若
郭庚年	霍凤仁	颜久石	薛赐夫
邴之			

编辑者

陈野(召集人) 王云缓 李梦学
黄加明 邹士明

图片资料 李小燕

前　　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电影艺术之花已开遍祖国大地，在现代中国不知道或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几乎是很少很少的了。可是，在1896年，当电影刚刚由西方传入中国在上海初映时，曾使多少人惊奇诧异，称其为“奇观”、“幻术”。从1905年中国人开始自己摄制影片至今，在不足八十年的时间内，伴随着世界电影艺术迅猛前进的脚步，中国电影事业也迈着扎实的步伐不断前进。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土壤上诞生，经受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风雨的洗礼，经历了由无声片到有声片、黑白片到彩色片的发展；特别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后，它在与中国人民的现实斗争紧密相联系的过程中，顽强而充满活力地成长起来，显现出现实主义的战斗风貌，造就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和有一定水平的电影工作者队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电影又进入一个划时代的新历史时期，老艺术家焕发出异彩，新人辈出，群星灿烂，在创作上亦取得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在近八十年的中国电影史上，电影工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才华和智慧，创造了许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影片，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个历史时期，产生了积极

进步的社会作用，为具有悠久历史的祖国文化增添了光彩，也为中国文化艺术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声誉。

《中国电影家列传》正是试图对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对在电影创作、理论研究、艺术实践、工程技术，以及在电影事业管理方面有所建树和成就的人们，逐一进行专文介绍。文中，将对电影家的生活经历、成长道路、艺术风格、创作特色、成就经验、失败教训等诸方面进行简略叙述和分析评价。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们在编写《列传》的过程中，努力和撰稿者一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不同历史时期的电影家的生平和创作，从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力求对他们做出合乎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据我们所知，《列传》中有些文章是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材料，经过认真研究后写成的。但是，如何评价一位电影家的思想发展、艺术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和失误，是一件十分复杂、细致而繁重的工作。因此，在文章中的分析和评价方面，难免会有偏颇之处，希望关注者予以指正。

电影艺术是一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很强的艺术事业，假如没有各种门类的配合，没有各类人才的涌现，电影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列传》中，我们不仅介绍一些有成就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以及卓有成就的影评家和有影响的电影事业家，并对艺术创作中的“幕后英雄”——美工、录音、剪辑、洗印等技术专家，也给予重视和相应的篇幅。从这些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逆

境中怎样磨炼意志，向困难搏斗，苦学技艺的顽强倔劲，最后在艺术创作中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他们的成材之路，对我们都有启发，并从中得到教益。

《列传》在介绍各位电影家传略时，力图做到图文并列、情文并茂，具有科学性、学术性和知识性。对于从事多种艺术领域创作活动的电影家，《列传》在着重介绍其电影方面的创作活动的同时，对他们在其它艺术领域的创作活动只进行重点介绍。

《列传》第一、二集，选录的人物是从本世纪初至三十年代即从事文艺工作，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老一辈电影艺术家、技术家和事业家，通过对他们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早期概貌。《列传》将分若干集陆续出版。我们将分别介绍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在解放区从事文艺工作，解放后转入电影工作的电影家；或从三十年代即进入戏剧、电影界，解放后又获得新成就的艺术家，和全国解放后成长起来的电影家。通过对这些人物的介绍，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故事片、新闻片、科教片、美术片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成长，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电影事业的成就和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新貌。同时，我们也试图通过这些电影家的工作实践，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每人各异的创作风格、流派，从各个不同的历史侧面，综合而成为一部通过对人物描绘编纂成的中国电影历史概述。

香港、台湾的电影事业，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将设专集介绍部分香港、台湾的电影家的生平和创作。

中国电影史研究，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一门年轻的研究学科。十年浩劫中，我们多年搜集起来的有关电影的历史资料被

江青一伙抢走失落，不少电影艺术家也被迫害致死，这就给电影史研究和撰写各种形式的电影家传略带来很大困难。这次编写《列传》，在资料缺，时间紧，人手少的情况下，得到了各电影制片厂及各电影单位和电影家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怀，才得以顺利出版。在这里，向那些帮助过我们的同志们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的条件和水平有限，《列传》中心有不少疏漏之处，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帮助和指教，以便在重版时改正。

中国电影家协会
电影史研究部

1981年4月30日

目 录

前 言	(1)
王士珍	(1)
王尘无	(4)
王瑞麟	(10)
史东山	(15)
白 杨	(24)
田 方	(37)
石凌鹤	(47)
司徒慧敏	(53)
孙师毅	(65)
任 光	(71)
阿 英	(76)
沈西苓	(84)
沈 浮	(92)
应云卫	(102)
阮玲玉	(111)
余省三	(120)
何兆璋	(124)
陈波儿	(132)
陈荒煤	(142)
杨小仲	(154)
金 焰	(161)

周诗穆	(169)
周剑云	(176)
罗明佑	(183)
邵醉翁	(191)
郑伯奇	(196)
郑正秋	(202)
郑崇兰	(210)
洪 深	(214)
张石川	(222)
宣景琳	(231)
赵 丹	(237)
查瑞根	(255)
夏 衍	(261)
袁牧之	(278)
聂 耳	(289)
殷秀岑	(297)
韩兰根	(302)
章 涵	(306)
黄绍芬	(313)
黄 汉	(318)
葛 琴	(323)
黎民伟	(327)
董克毅	(334)
蔡楚生	(338)
薛伯青	(350)
魏鹤龄	(356)



王士珍

(三十年代摄)

1925年，上海滩的一张小报上，刊登了天一影片公司招考摄影练习生的广告，引起了一位十五岁的绸布店徒工的好奇，他怀着侥幸的心理，前往应试，不料，幸运地被当场录取。这个偶然的机会，竟使这位绸布店的小徒工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并逐步成长为一位著名的电影摄影师。他，就是王士珍。

王士珍，上海市人，1901年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兄弟三人全靠当缫丝女工的母亲抚养。艰苦的生活条件，养成了他刻苦好学、勤奋上进的品格。这一点，在天一影片公司拜摄影师郑崇兰、徐绍宇为师学艺时，表现得更为突出。仅仅两年的时间，他便破例地获得了独立拍片资格，并且，很短时间内就在电影界获得了声誉。

他先后在天一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明星影片公司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摄影师，拍摄了大量的影片，而且

与许多知名编剧、导演、演员合作，完成了一些在中国电影史上负有盛名的作品。

1933年，茅盾原作、夏衍改编、程步高导演的进步影片《春蚕》，即是王士珍从影初期的作品。通过摄影，他真实而细腻地表现了剧中老通宝一家人的生活，刻画了他们劳动的喜悦和在贫困中挣扎的痛苦，勾画了旧中国农民贫困、农村破产的悲惨图画。这部影片是中国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观众的热切重视和普遍注意。这与王士珍在摄影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1933年，由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的《铁板红泪录》，也是王士珍摄影的作品。这是我国银幕上第一次暴露地主阶级的罪恶，描绘农民揭竿而起，自发地进行武装斗争的影片。当时，曾经轰动影坛，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三十年代，王士珍与程步高等导演合作，拍摄了一些反映抗日和社会题材的进步影片，如《同仇》、《华山艳史》、《到西北去》等等。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7月，王士珍在汉口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袁牧之、陈波儿主演的影片《八百壮士》。此片是根据“八·一三”发生在上海的真实的爱国事件编写而成的，充分表现了中国爱国军官的抗战热情以及爱国士兵、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影片在大后方放映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香港、菲律宾、缅甸等地上映时，也极为轰动。此片在法国、瑞士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上放映过，并且博得好评。王士珍完成此片后，又与导演何非光合作，拍摄了揭露日寇暴行的《保家乡》；与导演史东山合作，拍摄了兵役宣传片《好丈夫》。这些影片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抗日救国事业，起了配合宣传的作用。毋庸置疑，这

里面，也包括了王士珍作出的贡献。

1940年1月，王士珍参与了应云卫导演的《塞上风云》影片的摄制。这部影片是阳翰笙根据他那轰动一时的同名舞台剧改编的，是抗战时期第一部表现各民族团结抗日的影片，对激励我国各民族团结抗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该片摄制过程中，得到了当时整个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支持。音乐家盛家伦、著名演员舒绣文、黎莉莉、周伯勋等三十人参加了演出。摄制组远涉塞北沙漠，用八头骆驼装运全部器材，外景期历时九个多月，往返途中，还经过延安，受到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为该片谱写了音乐。十月，摄制组回到重庆，郭沫若写诗称赞他们：“以艺术的力量克服了民族的危机！以塞上的风云扫荡了后方的乌烟瘴气！”可见，影片本身及其拍摄过程，都表现了这个创作集体的崇高爱国精神。

王士珍的摄影，采光讲究，构图精良，他善于创造有气氛的画面，也擅长于维妙维肖的人像摄影。三十年代初，好莱坞著名摄影师、美籍华人黄宗霑先生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参观、访问时，对王士珍的摄影艺术极为赞赏。1945年秋，在黄宗霑的协助下，王士珍赴美深造，先后在柯达、二十世纪福克斯、派拉蒙、米高梅等影片公司参观、见习，学到了许多新技术和拍摄方法，以及当时尚属保密的彩色洗印方法。二年后，王士珍和华纳公司的美籍华人、洗印专家吴复源一起，携带了一批美国的电影器材，于1947年回国，在南京成立了农业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由吴复源任厂长，王士珍任副厂长。由于国民党对农业科学教育事业不重视，该厂仅有其名，始终未能投产。

1949年解放前夕，王士珍与吴复源一起，携带家眷前往台湾。

(姜思慎 江淑珍)

王 尘 无

王尘无是三十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是当时著名的电影评论家。

从青年时代起，王尘无就追求进步，倾向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后，他是党的电影小组的成员之一。当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他手持战斗的笔，以“尘无”、“向拉”、“方景亮”、“离工”等笔名，活跃在影评阵地上。

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前，中国电影界除个别影片公司、少数电影编导创作态度比较严肃，能制作一些具有初步民主进步思想的影片外，大多数仍是宣扬封建意识、买办思想的作品，一些神怪武侠片、凶杀色情片、鸳鸯蝴蝶派的影片充斥银幕，一派乌烟瘴气。这种情况，与当时日渐高涨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甚至起着麻醉腐蚀民众的作用。

1932年，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在领导进步电影创作的同时，迅速在电影批评方面开展了工作。创办了左翼电影工作者自己的理论与批评的刊物《电影艺术》；同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陆续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了电影副刊阵地，如《时报》的《电影时报》、《晨报》的《每日电影》、《申报》本埠增刊的《电影专刊》、《民报》的《电影与戏剧》、《中华日报》的《电

影新地》等。

1932年5月，《时报》的《电影时报》创刊后，尘无就首先借《电影时报》的地盘，上阵冲杀了几个回合，先后在这里发表了《电影讲话》、《电影在苏联》、《人道》等影评及文章。其中，6月15日发表的《电影在苏联》一文，介绍了苏联电影事业的情况，宣传了列宁关于“在一切艺术中，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是电影”的观点，宣传了苏联共产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电影的决议以及“电影必须经党之手，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启蒙及煽动的有力的武器”的思想。这些文章，为中国电影工作者打开了眼界，犹如一股清风吹进充满阴霾的影坛。

1932年6月18日，在党的电影小组的组织下，尘无和活跃在各电影剧刊阵地的左翼和进步的影评工作者蔡叔声（夏衍）、郑平子（郑伯奇）、张凤吾（阿英）、洪深、沈西苓、柯灵、陈鲤庭、鲁思等十五人一起，在《晨报》的《每日电影》上，联名发表了《我们的陈述，今后的批判》的声明，提出了今后电影批评工作的方针任务。这篇声明，是左翼电影理论工作的战斗宣言，也标志着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左翼影评队伍的建立。从此，尘无作为这支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展开了骁勇顽强的战斗。

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五月，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对电影文化协会成立时提出的电影文化运动的方针任务，展开了一次广泛的讨论，在《明星月报》上，尘无发表了《中国电影之路》一文，详尽地论述了电影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任务，指出“中国的革命目前还是在工农民主革命的阶段上”，“中国电影的当前的任务”，也应“同样

的是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¹“只有加强了电影从业员前进的领导，在电影企业中才能够发动他们为反帝反封建影片的摄制而斗争”。²文中还指出，反帝反封建的影片，在内容上，应“尽量引用大众的真生活”，并“拿大众每天接触的人物做主角”；在形式上，“也应非常明快”，“多动作，少对白，千万不要运用一切倒叙回忆等只有知识分子或则看惯电影的人才懂得的手法”。³文中，还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电影检查进行强烈控诉，指出要拍摄反帝反封建的影片，必须用“群众的力量争取摄制放映的绝对自由”。⁴

这次讨论，对左翼电影运动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都有重大意义。尘无的这篇文章，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33年，是左翼电影创作的高潮时期，“明星”、“联华”、“艺华”等影片公司都相继拍摄出了一大批左翼的和进步的影片。这些影片，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旗帜，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斗争，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对这些影片，尘无都曾发表影评文章，进行切实的报道和评介。尘无的影评，态度诚挚，褒贬公正，见地高深，剖析清晰，文风犀利，独树一帜，在观众和读者中有很高的声誉和威信。每当一部新片上映，有些青年观众都是等读了尘无的影评文章再决定是否观看的，尘无说好就一定去看，尘无说不好就决不光顾。不仅如此，尘无还能够理解创作人员的苦衷，尊重创作人员的劳动，在影评文章中，既有尖锐犀利的批评，又有热情诚恳的鼓励，还能深入具体地与创作人员一起探索研究些

^{1 2} 见尘无：《中国电影之路》（上），载《明星月报》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5月1日明星影片公司出版。

^{3 4} 尘无：《中国电影之路》（上），载《明星月报》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5月1日明星影片公司出版。

实际问题，在讨论中沟通思想、共同提高。因之，尘无与许多电影创作人员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使他的影评工作，在指导和促进左翼和进步的电影创作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左翼电影运动的成就，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文化战线上也进行了疯狂的反革命围剿，艺华公司被特务捣毁，就是这场白色恐怖的重要一幕。在电影理论阵地上，展开了一场关于“软性电影”的大论战。

早在1933年3月，在左翼电影运动刚刚开始高涨的时候，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刘呐鸥、黄嘉漠之流就极力诽谤左翼电影的反帝反封建主题、题材和内容，反对它们的革命倾向性。12月，他们发表了《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一文，正式抬出“软性电影论”的招牌，鼓吹“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宣称“我们的座右铭是：‘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1934年6月，黄嘉漠等借评几部美国片的机会，又大肆进行“软性电影论”的喧嚣。于是，以此为契机，夏衍、唐纳、鲁思等一大批左翼影评工作者便对“软性电影”分子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尘无以病弱之躯投入战斗，先后写了《清算刘呐鸥的理论》、《病余随笔——“艺术的快感”与客观的现实》、《论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底基础》、《答客问——关于电影批评的基本问题及其它》、《圣药与毒药》等文章，就左翼电影的大众化路线问题、主题和题材问题、艺术与政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真实性与倾向性问题等许多方面，宣传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指出“软性电影论”的反动实质及其危害。~~检举~~在“软性电影论”围击的战斗中，被同行赞为“鬼才”的尘无，发挥了自己的多方面的才能，除写了以上